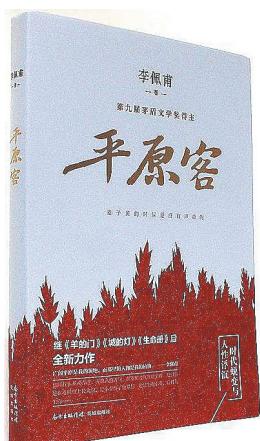


访谈

2018年11月28日，在第三届中国文学博鳌论坛的专题发言现场，第一个发言的，是著名作家、河南作协名誉主席李佩甫。今年65岁的李佩甫从1978年开始在《河南文艺》发表作品，距今刚好40年。在这40年的时间里，他收获了众多奖项，他的部分作品曾被译介到美国、日本、韩国等。2016年，他凭借长篇小说《生命册》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一年之后，他的长篇小说《平原客》出炉。今年4月23日，《平原客》入选“2017中国好书”图书目录。

11月28日中午，李佩甫就其写作人生接受了海南日报记者的专访。



李佩甫新作《平原客》



李佩甫的平原三部曲



陈东捷

11月27日至29日，第三届中国文学博鳌论坛在海南博鳌举行。来者名家云集，作为与会的一分子，随意与邻座搭个讪，待他（她）报上姓名，便是一阵惊喜：原来皆为业内久仰之名。28日晚，饭后在酒店大堂里溜达，突然发现前面竟是《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老师。作为一个从小看着《十月》长大，多年从事报纸文学副刊编辑并对文学一直心存欢喜的我来说，此时心里的激动自不待言，与陈老师打过招呼后，即兴聊起《十月》走过的那些岁月以及他关于创办文学期刊的经验。

文学期刊“刀马旦”的辉煌岁月

《十月》杂志是一本创办于1978年的大型文学杂志，今年刚好40岁，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龄，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40年文学的缩影。它主要登载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剧本、诗歌等文学作品。发行周期为双月一期。单月10日出版。陈东捷说，他于1991年开始担任《十月》杂志的编辑，从编辑到副主编到编审，再到如今的主编和编审，他陪着杂志社走过了整整27年，并且还将持续地走下去。

谈起杂志，陈东捷显得严肃、认真。他说1978年是个极为特殊的年份，那一年，所有的中国人都有一种热切的期盼，历经曲折的作

11月底的博鳌，没有了往日的晴空烈日，但在蒙蒙细雨中，多了几分诗意。从11月27日到29日，来自全国各地七十余位作家、评论家、文学期刊主编，相聚在第三届中国文学博鳌论坛，围绕“回顾与展望：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文学”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文学的经验，展望新时代中国文学的新书写。借此机会，海南日报记者对著名作家李佩甫和《十月》主编陈东捷进行了专访。

作家李佩甫： 平原是我的写作领地

■ 本报记者 杨道



李佩甫

初识世界以俄罗斯文学为底板

记者：我童年时读过您的《红蜘蛛》，当时就感觉这个名字有意思，文中有一种叫牛屎饼花的植物，印象深刻。这部小说里，是否有您童年的生活记忆？

李佩甫：我的童年记忆，就是两个“饥饿”。第一个饥饿是吃不饱肚子；第二个“饥饿”，是我对知识的渴求。那时候，我到处借书，却找不到书看。一个人的童年，几乎可以决定他的一生。我父母都不识字，我从上小学三年级起，就是我们家

最有文化的人了。那时候，我们家能找到有文字的东西，就是半本黄历。所以，凡是带文字的东西，我极为稀罕。记得小学三年级时，我们班的一个同学家里有书，书被他父亲锁在柜子里，他每次都偷出来让我看，每次都用东西去换，比如一块糖或是一块橡皮之类。他还有限制，一部大部头的书，只限我三天看完，所以很痛苦……后来稍大一点我到处借书看，到十五六岁时，我已经有了四个借书证。当时看书没有

选择，全是乱看，饥不择食。最早时有好多字还不认得，但大概意思是明白的，就囫囵吞枣地吞下去了。这也导致我后来常常把一些字的音读错，可谓落下了病根。

虽然小时候的阅读杂乱无章，但它让我连滚带爬地走出了底层的生活环境。我在文字中走遍了世界，视野越来越开阔，同时也明了了自己做人和作文的底线，这也可以算是对自己的一种清洗。

也是在小学三年级，我开始接触

俄罗斯的文学作品，有一篇名为《古丽娅的道路》的儿童文学让我印象极为深刻。文章的内容已不记得，但那些关于场景的描述，至今历历在目：漂亮的桌布、微微晃动的窗帘、香气袭人的面包……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美好、高贵和善良，还有美丽的爱情……可以说，我对于世界的认识，底板来自于俄罗斯的文学作品。在《童年》《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里，我见识了各种各样的人生。这些文学作品对我的滋养，无法估量。

每一个人都是背着“土地”行走的人

记者：今年4月，您的新作《平原客》入选“2017中国好书”图书目录。说说这部小说？

李佩甫：这部小说先后写作时间两年多一点，准备时间却长达10年。从表面上看，这应是一部“反腐”题材的作品，我写的是平原一个副省长的杀妻案。其实我写的是一个特定地域的精神生态，也可以说是一部“人民批判书”。改革开放这40年来，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人出现了“失重”现象。更可怕的是，大部分的人都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在平原，“客”是一种尊称。上至僚属、术士、东床、西席；下至亲朋、好友以至于走街卖浆之流，进了门统称为“客”。小说所提的“花客”，

名义上是协调花卉交易的中间人，实际上就是掮客。这部长篇的所有内容，都由这么一个“花客”引发。小说中“花们”的“轨迹”和“嬗变”，其实也就是人在时间中的变异和失速的过程。我认为，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背着土地行走的人”。而一个行走的民族，迫切需要建立的是全民都应遵守的规则。

记者：我读《生命册》时，感觉很震撼，小说的语言也极具质感，据说开头一句话您就写了一年？

李佩甫：我为这部作品准备了50年。这部作品书写的就是一个“背着土地行走的人”。主要是写“土壤”或者说写的是“背景”。在这部书里，所有的人物都是“我的”“生存背景”。

作。对我而言，写作最大的难度，是语言方面的。我一直认为，文学语言不是语言本身，它是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的表达。

而无论在生活还是写作中，我对这块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生活着的人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上世纪80年代，我认为金钱是万恶之源，但现在，我发现自己错了，贫穷对人的伤害超过了金钱对人的腐蚀，尤其精神上的贫穷。

采访结束，当海南日报记者提及自己也在尝试写小说时，李佩甫很诚恳地建议：写自己熟悉、热爱的这个地方。一个作家只有在最熟悉、最有感情的领域写作，才能写出好作品。

《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 为文学提供新鲜的写作经验

■ 本报记者 杨道



短篇小说《铁石老汉》以及李准的《创作札记》，此外还有介绍中文文学名著的“学习与借鉴”栏目。陈东捷说，当时创刊号上影响最大的作品当属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编辑部几千封的读者来信是它的凭证。

陈东捷说，《十月》几乎代表了一个时代，当代文学史上有名的作家，如汪曾祺、丁玲、艾青、宗璞、王蒙、张承志、莫言、铁凝、张贤亮、王安忆、贾平凹等都与之有着极深的渊源。于陈东捷个人而言，当年虽然未曾参与，但从同行前辈的记忆里回望《十月》创刊的时刻，便感觉一个阅读文学作品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心的时代降临了。而早在2004年，谢冕就曾为《十月》创作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份刊物和一个时代》。

“《十月》第一期刊发的文章有茅盾的《驳斥“四人帮”》

在文艺创作上的谬论并揭露其罪恶阴谋》、陆柱国的中篇小说《吐尔逊的故事》、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郑万隆的

《收获》复刊，一年后北京的《当代》创刊，陈东捷说，当时大家把这三本杂志称为“刀马旦”，因而那一段岁月也被戏称为“刀马旦”的辉煌。之后广州的《花城》、江苏的《钟山》纷纷涌现，许多大型文学刊物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全国各地生长。陈东捷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十月》成了那个时代的文学和思想窗口。

坚守作品质量，坚持创新挖掘新人

提及自己与《十月》的渊源，陈东捷说，这一过程还和海南有些关联。1988年某天，他从《海南日报》上了解到海南建省的消息。当时心里跃跃欲试，于是，他专门跑到海南驻北京办事处去咨询。对方很热情，回称可以安排他到海南工作，但不能留在海口，而是要到海南西部的八所（如今的东方市）某中学教书，其时他已在

北京的一所中学开始授课。经反复权衡，他最终放弃了到海南的机会。

提及目前纯文学杂志在生存上的困境，陈东捷说他来到《十月》杂志社工作时，文学

的热潮已经大大降低，各种媒体包括电视、报纸的普及，也让文学期刊很难再处于中心地位。但他并不悲观，随着中国文学创作的情况发生变化，《十月》也在慢慢调整自己的定位，但作品的质量、兼容并蓄与独创性是《十月》必须坚守坚持的，如此，才能源源不断地为中国文学提供新鲜的写作经验。同时，他们把目光转向中国之外的文学期刊。从2015年起，《十月》杂志与俄罗斯的同名《十月》杂志联合举办了三届“中俄十月文学论坛”。从今年起，他们还在杂志上开设了“世界文学期刊概览”专栏。

1999年，《十月》设立了一个新的栏目“小说新干线”。“我们希望关注那些不太有影响但有实力的青年作家。”陈东捷说，目前这个栏目已经有100多位年轻作家，他们都逐渐成为在文坛上有影响的作家，李浩和弋舟就是其中的代表。

说起发掘李浩的过程，陈东捷一脸欣慰的笑。他说当时无意中发现山东一小刊物上刊载李浩的小说，读后感觉不错。很快他给李浩写了一封约稿信。在《十月》上发表了作品的李浩迅速走红，但他们一直不曾谋面。8年之后，李浩到京开会，他才在《十月》杂志社的办公室里见到了李浩其人。

“《十月》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发掘年轻作者，发掘还没得到充分认可但已经显示出实力和潜力的作者。未来的文学高峰，应该就是从他们中间产生。”陈东捷说。



H点击

追求“笑果”是否消解了古诗之美

■ 好钱

近日，一位讲古诗的教授成了“网红”。不寻常路的“魔性”讲解为他圈粉无数，有网友把他赞誉为大学课堂里的“泥石流”——用“接地气”的幽默为诗歌讲解增加了许多不寻常的现场感。

但随着授课视频被大量转发，一些学院派人士对这种讲课方式提出了质疑。在面向学生，或广义上的受众——青少年或普通诗词学习者、爱好者们的讲授中，幽默感的目的是什么？讲课的趣味性、感染力、和知识性、严谨度之间，应该如何把握平衡？在古诗词文化普及大热的背景下，“网红”教授引发的广泛争议，其实也是大众对于诗词讲解方式、标准的一次集中探讨。

幽默风格是为重建“现场感”

如今只要在抖音中搜索“戴”，系统跳出的第一个相关联想，就是“戴建业”——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新晋的“网红”。截至记者发稿，仅一段他在大学课堂上讲解李白、杜甫与高适三人之旅的短视频，就已经获得了140万的“赞”，2.3万条评论。而像这样的讲课视频，还有几十条。

戴建业深受网友喜爱的原因，与他独特的讲课风格分不开。比如在获赞最多的那则短视频中，他说李白、杜甫与高适三人同行，一路什么都没有干，只是“找仙人，采仙草，炼仙丹”，最终蓬头垢面，也没成仙人。再如他分析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三》有“幽默感”，先说第一句写得“特别隆重”——种豆南山下。“你以为他种得挺好，他突然来一句，草盛豆苗稀。种的个鬼田！要是我种这个水平，我绝不写诗。”他生活化、个性化的“另类解读”，常常与诗人在大众心目中的固有形象形成巨大反转。再加上口语浓重的“麻辣普通话”，和激情澎湃的现场表现，造就了这些授课视频巨大的“笑果”和影响力。有不少网友模仿他的口头禅留言：“我贼喜欢这个鬼老师，讲课溜得很！”“对戴老师佩服得要死，他有才得要命，听懂了没有？”

骤然走红后，戴建业自己表示，幽默并非他刻意追求的效果，他只是真诚地在和学生聊天。他在抖音个人号上发言说：“读诗其实是与诗人的平等交流和对话，我试图重建原诗的现场感，让读者和听众能‘身临其境’。”

风趣讲解不应消解诗意

有意思的是，随着这一热点的持续发酵，网上渐渐出现了不一样的声音。有人指出了戴建业教授讲课中出现的知识性错误，并进一步质疑视频中的“幽默”讲法，是否真的有助于学生真正理解诗歌之意、赏析诗歌之美。事实上，随着近年来诗词文化的升温，在讲解中突出戏剧性、趣味性，而于知识性上有所疏漏的诗词普及已成为一种典型的现象。这次愈演愈烈的观点争锋，亦不失为大众对于诗词讲解、普及标准的一次适时的集中讨论。

由贵州师范大学副教授唐定坤撰写的一则题为《爆红幽默戴教授真的讲出了古诗之美吗？》的文章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和转发。在肯定戴建业讲课的幽默感的同时，唐定坤指出，恰恰是这种幽默之中，裹挟了一些错误的认识，误导了不少文本的理解向度，甚至消解了诗歌本身的美。以讲陶渊明的那一段授课内容为例，“种的个鬼田”虽然把幽默感讲出来了，但学生却并没有被引导去解读此诗的关键，即“草盛”仍要“种豆”的诗意追求，陶渊明追求的是一种“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境界。但戴教授的幽默解读，却转移了真正的焦点，消解了原诗的美感。此外，戴建业在课堂上说的“扬雄是汉代最好的赋家”，“明朝有个混蛋叫罗贯中，他把曹操写得坏死了”等表述，均或多或少存在不严谨的问题。唐定坤在文末这样总结：“教学、授业，都必须是建立在知识的准确性或思考的引导性上的。”幽默可以用作课堂调剂，不能“喧宾夺主”。

文章引发了两极化的评论。有不少人站在戴建业一边，认为授课应更为看重效果、感染力，通过风趣的讲解让更多学生对古诗产生兴趣。学生自然会在课后去品鉴；抓住几个细节上的疏漏来批评，未免“吹毛求疵”。更多人则同意唐定坤的看法，认为不能以“俗”来解“雅”，为了“笑果”牺牲准确性。

众说纷纭的背后，有专家提出，不妨重返问题的本源，思考一下，讲课风趣幽默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不是让更多人听课，而是让听课之人能更好地学习、理解授课的内容。对于古诗的学习而言，则是学会鉴赏古诗之美，理解诗中之意。即便是面向广大非专业人群的《百家讲坛》，也都是以此为标准。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姚华告诉记者，网上视频并不能完整呈现课堂全貌，抖音截取的也仅是最具戏剧化的片段，贸然评价容易断章取义。但抛开对个人的评断，单纯就视频中的授课方式来看，这种讲解虽说有趣，但并没有讲出古诗之美：“讲课确实应当尽量生动、富有感染力，莫让鲜活的古人与文学变得枯燥死寂，但同时也应当注重知识的严谨性，引导学生用敏锐的语言、艺术感受力和文学修养去发掘诗词之美。这两者并不矛盾，而后者甚至是更重要的。”

(文汇报)